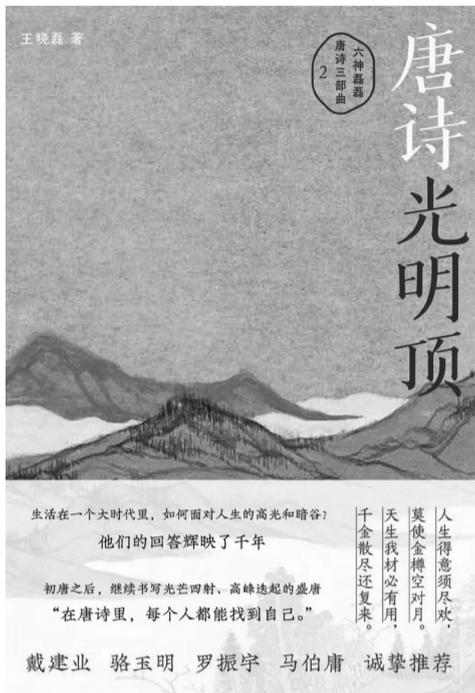


那个传奇的公元736年



《唐诗光明顶》
王晓磊(六神磊磊)著
新经典 | 文汇出版社

公元736年，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，这是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年份。

此时，唐朝已进入全面的繁荣时期，所谓“天下大治，河清海晏”。

全国人口正迈向史无前例的五千万大关，仓库里的财物堆积如山，似乎永远用不完。

有个成语叫“长安米贵”，但这句话在当时并不成立，那时米价便宜的青、齐等地不过一斗四五文，哪怕是长安、洛阳这两个昂贵的一线城市，米价也不过斗二十文，就算除去史料夸饰的成分，也是惊人便宜。相比之下，几十年后的肃宗、代宗时期米价都曾飙升到斗干钱以上。

此外，两京面价三十二文，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，所谓“天下无贵物”。

这一年，在文学和诗歌的领域，更是一个奇迹频发的年头。

这年，山东泰山迎来了一个青年游客，他叫杜甫。

彼时出门旅行十分便利，从洛阳一路行来，沿途都有旅店，甚至还可以租驴子代步。因为社会比较安定，歹徒少，“远适数千里，不持寸刃”，诗人们带着剑主要是为了拗造型。

杜甫这年二十四岁，身轻力壮，健步如飞。这是他人生中一段快乐的时光，尽管去年受了点挫折，在洛阳应试不第，但年轻嘛，输得起，大不了再考。

眺望着巍峨的东岳，但见苍翠的山峦绵延无尽，一片葱郁。朝阳升起来了，映着东岳泰山，也映着杜甫年轻的脸庞。他心情激荡地写下了一首诗，叫作《望岳》。

这是青年杜甫的代表作，也是唐诗里辉映后世的名篇。杜甫用这首力量磅礴的诗告诉世界，我将会登上顶峰，让群山都在我的脚下。

就在青年杜甫眺望泰山的这年，另一个诗人带着他的酒和宝剑，醉醺醺地来到了五岳中的另一座名山——嵩山。他叫李白。

李白有两位朋友在嵩山聚会，一个叫元丹丘，一个叫岑勋，二人约李白来喝酒。李白刚游太原返回，一听见酒字，风驰电掣地便来了。一场将辉映后世千年的“嵩山酒局”就此开场。

他们喝酒的地方是元丹丘的隐居处，极具形胜，举目远望，可以见到浩荡的汝水，还有藏在林中的古老的鹿台寺。李白喝得大醉，挥毫落纸，写出了一首叫《将进酒》的诗。

此前李白曾去过一次长安谋取功名，没得到重视。但李白认定挫折是暂时的，自己的才华一定不会被辜负。这一年，他仍然保持着活力，相信着明天：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
他们痛饮狂歌的声音回响在月下、山间，连那一刻的月色仿佛都染上了醉意。

提及嵩山，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王维。公元736年恰恰是王维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就在此前一年，在赋闲了近十年后，王维得到了宰相张九龄的推荐，被起复任用，并在本年得以随侍玄宗去长安。

这一年也就成了王维十载困顿之后最积极、乐观的一年。

王维专门写诗向嵩山的朋友们辞别。他说：“解薛登天朝，去师偶时哲。岂惟山中人，兼负松上月。”意思是：我脱掉了隐士的衣服，到朝廷去任职了。像这样跳进名利网，不但辜负了山中的高士们，也辜负了那松上的明月啊！

面对人生翻开的新一页，王维既有满满的期待，也有一份自嘲。这就是736年的王维。

同样是这年，另一个诗人也在嵩山隐居读书，那便是岑参。这年他二十一岁，跟着母亲在嵩山南麓居住。

岑家本来是很显赫的，此前曾三代为相，可惜都在政治斗争中倾覆了。最后一位宰相岑羲正是被李隆基杀掉的。

虽然家世浮沉，但少年岑参毫不气馁。他正在刻苦攻读，自信可以“云霄坐致，青紫俯拾”。“青紫”是指官员的衣服，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平步青云。

岑参居住的草屋靠近后世大名鼎鼎的少室山。他写诗说：“草堂近少室，夜静闻风松。月出潘陵尖，照见十六峰。”少林寺的钟声，曾无数次陪伴过他的晨读夜诵。

几年之后，岑参会走出嵩山，献书阙下，并成为一代顶尖的边塞诗人。

这一年，当帝国的东部孕育着传奇的同时，在西部，一些故事也正悄然上演。

在长安，年过七旬的贺知章每天上班打卡完毕，就会写写书法、痛饮美酒。他还会跑到素不相识的人家去喝酒，把荷包拍得山响，表示自己有钱。

不但资深年长的诗人活得潇洒，年轻人也活力无穷。仍然是在这年的长安，一位青年诗人和一个青年书法家订交，彼此成为好友。

这位诗人叫作高适，正在浪游长安。那位书法家叫作颜真卿。彼时高适三十二岁，颜真卿二十七岁，都是昂扬奋发的年纪。

这一年正是颜真卿初出茅庐之年。他参加了吏部铨选，这是士人从政的重要一步。在铨选中，颜真卿出手不凡，被评为高等，授朝散郎、秘书省校书郎。事实上，就凭他那一手艺压当世的书法，怕都要直接拉到满分。

高适则相对没那么幸运，那时尚未释褐，仍要再熬好些日子才能出仕。虽然两人际遇不同，但高适和颜真卿都真心欣赏对方，互相写下了不少诗歌唱和。

他俩不会知道，许多年后，当那场惊天动地的“安史之乱”发生时，两人会一文一武，各自成为朝堂的栋梁，共同支撑起大唐的一片天空。

那一年，高适还和另一位草书名家张旭成了朋友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结为莫逆之交。高适曾写诗给张旭。《醉后赠张九旭》这首诗充满了亲切的调侃，把张旭酒后的憨态写得活灵活现，也可见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。

这一年，还有许多的诗人也正迎来人生的壮盛时节。王昌龄之前刚选了博学宏词科，授了汜水县尉；王之涣在四方遨游，远至塞外，写下一首又一首诗篇，声名愈加昭彰。

这一段时光，不但是唐朝最兴旺的时光，也是盛唐诗人最好的时光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正精力旺盛、朝气蓬勃，对未来充满着期待，觉得一切皆有可能。

李白还没品尝到后来被世人误解、仇视的滋味；杜甫还不知道未来的颠沛与艰辛；王维还怀揣着一份进取之心，人生态度也不曾完全佛系；王昌龄还没被谗毁，仍然在风风火火地打拼；高适还在韬光养晦；岑参正跃跃欲试；贺知章正品着酒优哉游哉；孟浩然则已经收获了内心的平静，不像早年那样纠结不忿了，而是尽情享受田园的逸乐。

那一年，他们不断奔走，徜徉在中国的大地上，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歌，名作一篇又一篇往外蹿，你一篇《望岳》，我一篇《将进酒》，可说争奇斗艳、耀眼生辉。张九龄的《感遇》已经在酝酿之中，呼之欲出。它将会传承《离骚》的余韵，成为人间最美、最有态度的组诗之一。王维快要出塞了，他的《使至塞上》次年就会诞生，给我们留下无法忘怀的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。

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。世间最令人欣悦的便是希望二字，那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。公元736年，便是诗人们希望最饱满的年代，是孕育着最大可能性的年代。这一年，光压着暗，青春压着苟且，信心是最响亮的调子，明天是最让人期待的物事。恰如李白那句“阳春召我以烟景”，这一年就是唐诗的烟花三月。

让我们记住这一年，记住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以及一张张或昂扬、或振奋、或倔强、或闲适的面孔。这不禁让人想起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几句诗：多幸福啊，此日，此月，此年。此季，此刻，此时，此一瞬。

神秘的乌尔



〔英〕哈丽特·克劳福德著
李雪晴译
商务印书馆
《乌尔：月神之城》

内容简介

壮盛、明亮的历史时刻，大唐最有魅力的诗人纷纷登场——冲出岭南、征服长安的小镇青年张九龄；拥有了一个少年最好的开场，从高峰跌落也能活出诗情画意的王维；浑金璞玉又时而情商欠费的李白；失意半生、终青云直上撑起大唐一片天空的高适；徘徊在盛唐诗人圈边缘，却逆袭成为时代最强代言的杜甫……

他们或昂扬、或闲适、或奔放、或傲诞，在盛世的诗酒风流中兑现着天赋，写下最好的年华。而高峰之所以为高峰，就是当遭遇从极盛的顶峰掉头向下的失落时刻，他们的诗歌依然能照见幽微、擦亮夜空。

作者简介

王晓磊

笔名六神磊磊。曾任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。2013年起开始写作，对唐诗和武侠小说进行解读，因为犀利、独到的视角而广受好评，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唐诗解读、普及者之一。著有《唐诗寒武纪》《六神磊磊读唐诗》《给孩子的唐诗课》《六神磊磊读金庸》等。

内容简介

乌尔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，在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曾是贸易和文明的中心。本书着眼于乌尔的过去，不仅介绍了这座古代城市及其几千年来变迁，还考察了近代的考古学解释。

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很多欧洲人来说，迦勒底人的乌尔(Ur of the Chaldees)这一名称，会令他们想起典型的神秘东方人——留着胡须、身着白色长袍，或是骑着骏马的野蛮部落成员。对今天的伊拉克人来说，乌尔是他们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一处遗址。得益于学者常年细致的工作，我们现在知道乌尔实际的居民区繁荣发展了5000多年，多数时候这里还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。这种持久得益于乌尔在波斯湾顶端的地理位置，这让它得以控制一条早期最重要的贸易路线，经由这一路线，金属和很多其他货物被带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核心地带。虽然还有其他相对次要的陆上贸易路线，但对金属贸易的特别控制无疑使乌尔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。此外，从遗址发现的古迹和人工制品可以明显看出，贸易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

在西北部，幼发拉底河将乌尔与安纳托利亚腹地直接相连，这使其成为最具战略意义的早期城市。其他城市很少有这样绝佳的内外联系。乌尔的全盛期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，当时它的统治者与平原上的其他城市同等竞争，最终统治了整片区域，建立了该地区最早的帝国。公元前1800年前后，乌尔遭到破坏；由于城市贸易纽带和守护神月神辛的地位，这里很快重建起来，并作为地区首府获得了新生。直到波斯湾海岸南退，接着河道东移，才导致了乌尔的废弃。

在西方，乌尔的早期名声来自《创世记》的描述，说这座城是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的出生地。在此时间范围内，根据幼发拉底河以西10英里的一群土丘确认乌尔位于现在伊拉克南部的沙漠中，是相对晚近的事情。第一位造访这里的欧洲人可能是17世纪早期的意大利旅行者彼得罗·代拉·瓦勒，他返回时带走了有楔形文字铭文——当时还没有人能阅读这种文字——的砖块和一些滚筒印章。19世纪早期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，欧洲人重新燃起了确认古城位置的兴趣。人们提出了很多选项，其中受到最多支持的是被称为穆克吉尔的土丘，即沥青丘。这里因在暴露的砖结构中使用沥青而非砂浆得名。1835年，詹姆斯·贝利·弗雷泽到访遗址。他描绘了位于土丘中央的两层建筑——后来被认定为塔庙或者神庙的塔，并步测了建筑的面积。

……

乌尔遗址对造访者并不友好。它位于巴格达以南220英里、距幼发拉底河现代河道以西约10英里的一处低洼荒地和沙丘上。这里过去靠近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铁路，这段铁路是未能完工的柏林到巴士拉路线的一部分。造访者可以乘巴格达的火车在名为乌尔枢纽的地方下车，那里有一条转向纳西里耶的支线，行驶过沙漠仅仅两英里就可以到达遗址。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车站被关闭，造访者只能选择漫长而炎热的四轮车旅行。现在利用卫星照片和现代勘探设备，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环境在过去有很大不同。定居点建立时——公元前六千纪晚期至公元前五千纪晚期的欧贝德时期——波斯湾的水位正在上升。到1000多年后的乌鲁克时期，水位比今天高出2.5米，海岸线一直延伸到乌尔，形成了新的沼泽和三角洲。波奈尔是解读卫星照片的专家，他将乌尔这样的早期定居点描述为“沼泽平原上的岛屿，位于广阔三角洲沼泽地的边缘和中心……水道更多地作为灌溉沟渠而不是交通路线”。洛夫特斯在1857年写道：尽管如此，“在洪水期[乌尔]完全被水环绕”。20世纪20年代，马洛温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。